

新媒体事件：“网络最优化”倾向与 “公共领域”建构

蒋谢尔

摘要：建立在网络媒体之上的“新媒体”事件在某些结构性压力之下显现出“网络最优化”倾向，网际或现实突发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及支持者，利用网络的匿名性、便捷性、开放性等特征，倾向于选择网络作为唤起公共舆论同情、传统媒体支持、政府关注的最优方式途径，并有朝失范型发展的可能，尽管如此，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新媒体事件不失为“公共领域”建构的一种尝试。

关键词：新媒体事件；网络传播；公共领域

作者简介：蒋谢尔，女。（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28）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0）05-0034-04

媒体事件是“历史的现场直播”，这是西方学者戴杨（Dayan）与卡茨（Katz）在《媒体事件》一书中提出的著名观点，他们分析电视直播出现以来，尤其随着卫星直播技术的普及，政经势力可以更有效地组织“电视仪式”（televised ritual），塑造集体记忆，达成社会共识。

所谓新媒体事件是指由网络、移动媒体等为主的新媒体发布信息、形成相应舆论进而为民众广泛关注并可能采取相应行动的热点事件。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经新媒体披露和传播后，在一定条件下，会由孤立的事件发展为可持续的运动，在营造群体氛围的基础上影响主流社会，其传播效果得到放大。他所标志的不仅是媒体形态的变化，或是媒介生态系统的扩展，而更是媒体内容、话语权、主体性的变迁，是网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笔者以为，这是公民新闻以及“群众书写”的要点所在，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信息中下阶层加入创造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也是新媒体事件最根本的“新”特征。

笔者以为，从西方学界对集群行为的描述来分析新媒体事件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西方社会学概念上的“集体行为”或“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系指一大群人以匿名方式从事不同寻常的活动，这种行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遵守原有规范和模式的惯常行为”^[1]、“集体行为是指那些相对自发的、无组织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2]。从这些定义不难推出许多新媒体事件是在web2.0时代新出现的一种集群行为，相较于传统群体性事件，其形成机制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网络等新媒体则作为重要的变量在机制发生的各个环节发挥新的作用，这正是新媒体事件的研究价值所在，透过这类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给社会带来的新的、重要的变化。

一、为何选择网络：热点事件的“网络最优化”倾向

细数近年来知名度较高的新媒体事件，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厦门PX项目，与教育公平有关的罗彩霞案，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端午节申遗之争，与医疗卫生相关的南京市儿童医院徐宝宝事件，与公共网络资源相关的绿坝事件，与行政执法有关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新媒体事件正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网民把握出这样一种解决社会冲突的非制度形式：冲突发生——网络舆论——传统媒体介入——舆论升级——政府关

注——冲突解决。在这种非制度形式的冲突解决方式的不断实践中，新媒体事件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者体现出“网络最优化”的倾向。

笔者认为，群体性事件的“网络最优化”倾向是指在某些结构性压力之下，网际或现实突发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及支持者，利用网络的匿名性、便捷性、开放性等特征，倾向于选择网络作为唤起公共舆论同情、传统媒体支持、政府关注的最优方式、途径。其结果会表现为新媒体事件的多发性。

首先，网络能够为集群行为的发生提供相对自由的互动空间。网络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网络功能的多元化，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论坛/社区、个人博客/播客等，都可以提高人们网络交流的便捷性。“网络所具备的交互式联系，大大提高了社会交往水平……当发生某一事件时，人们可共享重要信息，不受地域和场所的限制。”^[3]相较于一般的集群方式，诸如集会、游行、静坐、示威等都需要现实的公共空间，而这种公共空间在中国则是处于政府的强力控制之下。网络接近的便利，以及交流方式的迅捷都降低了参与者的心理和社会成本。而网络与手机的功能融合，使得参与者的交流更加脱离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限制。

其次，网络的“放大镜”功能。根据 CNNIC 的最新调查，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达到了 3.38 亿人，占总人口的 25.5%，而手机网民规模也达到了 1.55 亿人。也就是说，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上网，属于网络传播的一个节点，按照网络的技术逻辑，每个节点都能与其他节点发生传播关系。因此，一个有争议的事件一旦经过有序地“网络舆论操盘”，获得上百万级点击量的可能性极大。除了这种量化的放大效应，网络传播还能呈现出质化的矛盾加深和放大。随着集群参与者的增加，其多元化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将会丰富群体对冲突和矛盾的解析，网络就是这样聚合各种社会力量全方位的参与社会冲突，使得冲突结构和焦点由表及里，直至触及制度性的反思。

再次，社会控制力度的分散，降低了惩罚的有效性。在现实生活中，群体性事件往往是一种压迫性的爆发，参与者是在制度内的冲突解决机制失效的情况下才选择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向政府求解。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控制程度非常高，这种控制多是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实施惩罚。但是网络则降低了这种惩罚的有效性，一方面是网络监管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存在着很多的法律漏洞，另一方面新媒体事件参与规模往往是一般群体性事件的数百万倍，从而使得惩罚对象分散，分化了社会控制力度；

最后，新媒体事件的烈度较低，政府对网络舆论的接受和重视。相较于一般的群体性事件，新媒体事件的形式一般表现为网络审判、人肉搜索、网络恶搞、网络留言、网络集会五种形式，多表现为“言说”的层面，对政府部门的实体冲击并不多，其烈度往往比较低，所以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接受网络舆论的监督。但是，“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密不可分，新媒体事件具有网下发展的潜在倾向，因此，政府越来越重视网上的民意表达，网络听证、网上官民互动等都是政府主动运用网络资源以及对网络舆论重视的表现。政府的此种姿态会加强网民“网络使用有效性高”的心理暗示。

二、规范型新媒体事件：新媒体“公共领域”建构的一种尝试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矛盾复杂，社会问题频现，社会和谐、公平正义已成为政府与公众的公共话语。一方面，社会结构中的某些弊端程度不等地削弱了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整合机制，社会资源及利益在某些地方有向少数人手中转移的现象。这使一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了“相对剥夺感”，他们对于社会公正的诉求非常强烈；另一方面，一部分公权力拥有者的行为失范，降低了政府及相关机构、部门在公众心中的权威感和公信力，这从“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事件”等新媒体事件中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遭到众多网民的质疑、抵制可见一斑。

传播学批判学派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正在逐步具备公共领域的这种特征。一方面，公民自觉运用网络进行自上而下的公民行动，使得网络作为公共领域可以有

所作为；另一方面，网络本身的技术提高和功能拓展，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渠道。这种渠道，在我国制度化参与渠道不够畅通、网民庞大而又积极的现实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进一步的，公民自身公共意识的觉醒以及建立一套合乎规范的公共利益表达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公民超越私人领域通过公共领域与国家/政府意志产生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规范化可以被视为建构公共领域的一项尝试。以“《深圳，你被谁抛弃》网文事件”为例，不仅作者具有一定的公民意识，参与该事件的大量网民也表现出了自觉性和自主性。在长达两个多月时间里，这篇网文高居各网站点击量排行榜的前列，参与网民达数百万之众，讨论主题深入到自身权利、民主政治等层面，引起了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网文部分内容还被写进内参送交北京高层。如此，网络才真正具有了公共领域的某些特征。

哈贝马斯指出，随着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活动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具有意识批判功能的报刊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为向商业化报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乃至商业化成为必由之路。由于新闻版面与广告版面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略公共领域的入口。另一方面，商业性报刊结构转型的各个方面与报业的集中，尤其是报团的出现和技术一体化的趋势相关联。因此，报刊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自身也越来越容易被操纵了。但是20世纪出现的新传媒——电影、广播和电视，由于耗资巨大，威力惊人，这些媒体在包括英、德、法在内的许多国家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通讯社（路透社、德新社和法新社）从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私人机构变成官方半官方机构。^[4]

哈贝马斯研究的是西方国家的情形，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当然不宜将其理论主张简单地、直接地移植到中国。但他的某些研究结论例如关于公共领域的见解有着一定的可供借鉴的价值。传统媒介在承担公共领域建设方面效用不彰，从全球范围看，首先源于传媒的商业化、全球化使得资本的控制力的增强，传播效率越高，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影响。其次，公权力的介入也从未消失。最后，与网络媒介相比，三大传统媒介“先天不足”（特别是传播技术方面），易受控制，不能充分满足大众的表达需要。以美国为例，“美国报业从一开始就不是公共精神的理想载体，报业的出版自由不等于人民的表达自由，最初为政治偏见所左右，之后为广告收入与经济利益所支配。”^[5]与此对应的是，网络时代新媒体崛起并承担建构公共领域的重任。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参与主体通常是非理性的，不少新媒体事件存在着朝失范型发展的危险倾向。网络审判、人肉搜索、网络恶搞、网络流言、网络集会五种最为典型的新媒体事件行为方式。网络审判成为语言暴力，人肉搜索侵害个人合法私域，网络流言引起人心惶惶，网络集会则诉诸极端民族主义。新媒体事件的失范在向人们暗示，新媒体事件在本质上就是负面的和具有破坏性的，仅存的正面意义只是充当社会的“减压阀”。这一切源于大众的非理性化，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加剧了人们对群体的需求和渴望，因此在群体行为时，人的理智水平和理性能力处于最低状态。事实上，虚拟的网络是现实社会人类交往的延伸，只要存在群体互动，群体压力就不可能消失，与此同时网络的匿名性会弱化群体的约束力，使得个体的行动更趋于非理性。因此，我们更呼唤一种规范型的新媒体事件，这样一种模式能够更为建设性的发挥作用。

通过历时性考察可以发现，2003年“孙志刚事件”促进了收容制度的改变；2007年“重庆钉子户事件”意味着公民私权不受公权力的侵害；在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中信息公开成为化解危机的关键。2009年多起新媒体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于自身合法权益以及边缘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使得政府部门注意到了公权力行使不当或“不作为”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从而加大了住房、医疗、公共设施等公共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力度。以“邓玉娇事件”、“跨省追捕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为代表的新媒体事件得以解决，使得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了保障；“杭州飙车事件”使得有关部门重视超速行驶、醉酒驾车对于公民的伤害；“周久耕事件”使得网络反腐效用彰显，推动了国家一系列网络反腐措施的出台。较之传统途径，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领域可以成为公民寻求公共资源分配制度改革和利益结

构重新调整的重要方式。新媒体事件如能以一种规范型公共性实践的理性面貌出现，不仅能引起政府的高度甚至能引发政策的改进。与此同时，公权力一方在面对新媒体事件时也适时调整，与时俱进。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说，“互联网力量不断壮大，我希望顺势而为，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即每个部门都应该有人负责在网络上主动发布信息，及时解答问题。由于网络虚拟的特殊性，这方面更需要权威性建设，比如政府部门应该公开身份直接回应、直接解决问题，而不是暗中派一批人，用些虚拟网名在网络上发言‘引导舆论导向’。”^[6]这体现了有关部门领导干部对新媒体热点事件的理性思考，相信与此思考相对应的实践可产生积极的成效。

参考文献：

[1] [美] 赖特. 社会学 [M]. 林义男译. 巨流图书公司, 1987, 782, 转引自朱力. 社会学原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281.

[2] [美] 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566.

[3] 杜骏飞. 网络传播概论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76.

[4] [德]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 曹卫东、刘北城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221 – 231.

[5] 郭镇之. 舆论监督、客观性与新闻专业主义 [J]. 电视研究. 2000 (3) . 71.

[6] 伍皓. 宣传部门不能墨守成规 [J]. 南风窗, 2009 (14). 来源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558/page/3>.